

龙山时代：新风尚与旧传统^{*}

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市 100872)

关键词: 龙山时代; 龙山文化; 龙山化

摘要: 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至前2千纪之初, 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分布着龙山时代诸文化, 但细较起来, 各区域进入龙山新时代和摆脱前龙山旧传统的时间并不一致。就中原和海岱地区来说, 鲁东南和临汾盆地最早, 约在公元前2500年; 其次是鲁西、豫东皖北、河南中部, 在公元前2400~前2300年; 最后是晋南运城和垣曲盆地、豫西三门峡地区, 在公元前2200~前2100年。至于龙山旧传统和二里头新风尚的交替时间, 则以洛阳盆地最早, 约在公元前1750年, 周边地区依次早晚, 最晚可能迟至约公元前1600年。

Keywords: Longshan Period; Longshan Culture; Longshanization

Abstract: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 various cultures, all having been classified to be types of Longshan culture, scattered in the vast area along the Yellow River and Yangtze River. After careful examination, it has been discovered that the time when these cultures broke away from conventions that formed before Longshan period and entered the new era of Longshan culture vari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Haidai District, southeastern Shandong Province and Linfen Basin were the earliest to enter Longshan period, around 2500 B.C.; from 2400 B.C. to 2300 B.C., this exact cultural period dawned in western Shandong Province, the area stretching from eastern Henan Province to northern Anhui Province, and the central part of Henan Province; between 2200 B.C. to 2100 B.C., Yuncheng and Yuanqu Basin, both in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 and Sanmenxia, in western Henan Province, welcomed Longshan period. As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conventions prevailing in Longshan period to new trends prevalent during Erlitou period, its earliest occurrence was around 1750 B.C. in Luoyang Basin. Such changes happened subsequently in adjacent areas, no later than 1600 B.C..

DOI:10.16143/j.cnki.1001-9928.2019.04.005

1981年, 严文明提出“龙山时代”这个概念, 用以指称和龙山文化大体同时的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文化所处的时代, 并认为其绝对年代“大体上落在公元前26~前21世纪之间”^[1]。但不少学者所理解的龙山时代, 实际包括更早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阶段在内, 年代上限也就早到公元前3千纪之初^[2]。按理说, 既然“龙山时代”得名于龙山文化, 就以与龙山文化时间相当为宜, 何况黄河、长江流域文化格局的重大调整就是发生在公元前3千纪前后叶之交, 而非

公元前3千纪之初^[3], 因此, 本文所谓龙山时代, 仍是从其本意。

即便按照龙山时代的本意, 近年的一些新观点也足以引起重视。最有代表性者, 就是有学者根据新的测年数据, 认为进入龙山时代整体上要晚至公元前2300年以后^[4]; 至于龙山时代的下限, 各地参差不一, 但都比公元前21世纪晚许多。龙山时代已属铜石并用时代晚期, 龙山后期可能已经进入夏代, 对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来说, 二三百年的时间差可不是小事, 有必要加以讨论。形成差异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18ZDA172)阶段性成果之一。

的原因,也不仅仅是有了新的测年方法和测年数据,主要还在于对异常复杂的“龙山化”的过程认识不清,没有充分注意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滞后”问题^[5]。实际上,各文化区之间,甚至文化区内各小区之间,进入和脱离“龙山”的年代都可能参差不齐,新风尚和旧传统并存,应当是龙山时代的普遍现象。以下仅以海岱和中原地区为例进行分析。

一

海岱地区在龙山之初,龙山文化新风尚和大汶口文化旧传统在不同区域曾一度并存;岳石之初,岳石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也当如此,只是不如前者看得清楚。海岱地区的龙山化,最早始于鲁东南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转变^[6],随后再逐渐扩展至山东全境乃至周边地区。至于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转变,则可能最早发生在鲁西区。统计显示,鲁东区前期遗存众多,而后期很少,鲁西区则正好相反^[7],尤其现在的黄河以西地区,就基本不见龙山偏早阶段的遗存。在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转变当中,鼎、鬶、豆、深腹罐、高柄杯等主体陶器,都只是在大汶口文化基础上发生了细微变化,可见属于文化内部变革性质。龙山文化还缺乏新的系统测年数据,以往的数据早晚偏差较大,一般都是把大汶口文化晚期和岳石文化早期的数据也考虑进来,认为整体上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600~前2000年^[8],如果调整为公元前2500~前1700年^[9],或许更为合适一些。其前后期的分界就应该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

海岱南邻的豫东皖北地区大汶口文化向造律台文化的转变,也当晚于鲁东南区龙山文化的诞生。从蒙城尉迟寺遗址来看,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部分遗存,已经见有龙山

文化早期的蛋壳高柄杯、贯耳罐、鬶等因素,说明相对年代已经进入龙山时代^[10]。明确进入造律台文化早期的遗存,以蚌埠禹会^[11]、淮阳平粮台遗存为代表^[12],新的测年上限在公元前2400~前2300年。造律台文化的主体器类均继承自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但又受到龙山文化的强烈影响,此外还有和王湾三期文化前期、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末期类似的因素。造律台文化的出现当与龙山文化的西南向拓展有因果关系,有学者甚至直接将其归入龙山文化范畴^[13]。此外,豫东皖北地区造律台文化向岳石文化的转变,也应晚于鲁西地区。

二

中原地区在龙山之初,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新风尚和庙底沟二期类型旧传统并存过较长时间。二里头文化之初,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新风尚也和周边龙山旧传统并存过一定时期。

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是东来文化和土著文化融合的结果。因为有玉器、美陶、鼉鼓、厨刀、棺椁大墓等大量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因素的进入,就和土著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有了质的区别^[14]。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南的运城、垣曲盆地仍保持庙底沟二期类型的旧传统,只是各种器物发生了细微变化,并增添了来自陶寺文化、石家河文化等的新因素^[15]。即便如芮城清凉寺那样的高级墓地,随葬了许多源自东方的玉器,而陶器仍顽强保持着旧传统^[16]。至龙山后期,随着北方地区老虎山文化的南下,陶寺文化蜕变为陶寺晚期文化,老虎山文化或陶寺晚期文化的陶高等继续南下,和北上的王湾三期文化相遇,使得运城和垣曲盆地文化转变为王湾三期文化三里桥类型,庙底沟二期旧传统才告以结束^[17]。晋西南龙山时代之后

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分布区，东下冯类型最早期略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18]，可见该地区的龙山旧传统，和豫西的二里头文化新风尚也有过短暂并存。

龙山前期之初，在豫西三门峡地区仍然是庙底沟二期类型末期的旧传统，洛阳附近地区仍为仰韶文化谷水河类型末期的旧传统——该类型其实和庙底沟二期类型颇为相近^[19]。同时，在豫中地区则已经形成新的王湾三期文化郝家台类型^[20]。最早的王湾三期文化虽以谷水河类型为基础，但有鬻、鸟首形足鼎、折盘豆、圈足盘、觚形杯、折腹壶等诸多龙山文化因素，以及漏斗形播钵、宽扁式足鼎、红陶斜腹杯等较多石家河文化因素，显见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影响是王湾三期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尤以龙山文化最为关键^[21]。龙山后期，王湾三期文化大规模南下，造成石家河文化的衰亡。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结束，则以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诞生为标志，但其向四周的扩展，总要有个过程。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分布范围到达豫南地区^[22]，三期到达湖北地区^[23]，这些地区的龙山旧传统也就一直延续到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时。

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传统观点认为在公元前2500~前1900年^[24]，新观点调整为公元前2300~前1900年^[25]。但仔细分析，新观点所提供的“陶寺文化早期”的数据上限基本仍是在公元前25世纪左右，和传统观点并没有很大冲突。新测王湾三期文化“最早”的数据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26]，但实际上其相对年代已经属于王湾三期文化前期偏晚阶段。因此，本文将陶寺文化年代上限仍推定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王湾三期文化上限在约公元前2400年。至于王湾三期文化的下限，洛阳盆地当以二里头文化的出现为界，二里头一期最新拟合数据约在公元前1750年^[27]，周围地区逐渐延迟，晋

南陶寺晚期文化和三里桥类型的下限就应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豫南和湖北的龙山旧传统还当延续得更晚，或至公元前1700~前1600年^[28]。至于王湾三期文化前后期的界限，大约就在公元前2100年。

三

总体而言，海岱和中原龙山新风尚和前龙山旧传统交替的步伐快慢不同：鲁东南和临汾盆地最早，约在公元前2500年；其次是鲁西、豫东皖北、河南中部，在公元前2400~前2300年；最后是晋南运城和垣曲盆地、豫西三门峡地区，在公元前2200~前2100年——而这已经基本是整个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的时间了，也差不多就是进入夏代的时间点。至于龙山旧传统和二里头新风尚的交替时间，则以洛阳盆地最早，约公元前1750年，周边地区依次早晚，最晚可能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勉强可以归入龙山时代的齐家文化的下限，甚至可以晚到约公元前1500年^[29]。绝对年代有相对性，相对年代有绝对性^[30]。由于测年数据限制，本文所推定的绝对年代，或许只有相对参考价值，但各地区“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早晚参差不一，则是可以肯定的。

在龙山化的过程中，鲁东南龙山文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其向周围的拓展影响，直接带动了鲁西、豫东皖北、河南中部、豫北冀南等地区跨入龙山时代。临汾盆地陶寺文化和豫北冀南后冈二期文化的诞生，则可能对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的形成有某种激励作用。另外，鲁东南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的产生也可能有一定联系，存在鲁东南龙山文化压迫鲁北等地大汶口文化西移促成陶寺文化的可能性。扩大视野，会发现石家河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齐家文化也都在大约2500年或稍后进入龙山时代。要之，龙山时代的

形成,是黄河、长江流域各文化频繁互动交流的结果,龙山时代诸文化实际成为新时期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主体文化。

- [1] 严文明. 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 文物, 1981, (6).
- [2] 《庙底沟与三里桥》结语说:“庙底沟二期文化,很可能为龙山早期或由仰韶到龙山的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这应当就是部分学者将龙山时代延伸到庙底沟二期、大汶口晚期阶段的出发点。(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1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68~85页。)严文明也曾有过将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划归“龙山时代的早期”的意见,(严文明:《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的思考》,《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第39~45页。)但更多的时候则仍坚持他最初的看法。(严文明:《重建早期中国的历史》,《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5~23页。)
- [3] a. 韩建业. 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 考古学报, 2006, (2).
b. 王立新. 关于“龙山时代”的概念//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24~27.
- [4] a. 何弩. 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第3卷).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54~86.
b. 方燕明. 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碳十四测年的若干问题讨论. 中原文物, 2015, (2).
c. 戴向明. 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社会复杂化的进程//考古学研究(十).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539~581.
- [5] a. 诺埃尔·巴纳德. 对广汉埋藏坑青铜器及其他器物之意义的初步认识//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25~66.
b. 李伯谦. 从对三星堆青铜器年代的不同认识谈到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文化滞后”理论//四川考古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64~69.
- [6] 大汶口文化晚期鲁东南地区突然涌现出很多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如胶州三里河、日照东海峪、诸城呈子、莒县陵阳河、莒县大朱家村等,这些新来的人群少受传统的束缚,富于创新,终于最早完成从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蜕变,并进而影响到龙山时代的形成。[孙波:《再论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古代文明》(第6卷),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2~33页。]
- [7] 栾丰实. 试析海岱龙山文化东、西部遗址分布的区域差异//海岱考古(第九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401~411.
- [8] a. 栾丰实. 海岱龙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海岱地区考古研究.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229~282.
b. 栾丰实. 大汶口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海岱地区考古研究.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69~113.
c. 栾丰实. 岳石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海岱地区考古研究.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318~347.
- [9] 栾丰实参考中原等地新的测年数据,将龙山文化年代调整为公元前2400年(或前2300年)至前1800年。[栾丰实:《试析海岱龙山文化东、西部遗址分布的区域差异》,《海岱考古》(第九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02页。]
- [10] 出典型龙山式蛋壳高柄杯的M171,出龙山式贯耳罐的F51,陶器群面貌总体当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发掘者根据测年判断其下限约在公元前2400年。只是前者被第一部报告作为大汶口文化遗存介绍,后者被第二部报告作为龙山文化遗存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1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蒙城尉迟寺》(第二部),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30页。]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 蚌埠禹会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 [1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龙山时期墓葬发掘报告. 华夏考古, 2017, (3).
- [13] 栾丰实. 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初论. 考古, 1992, (10).
- [14] a. 韩建业. 唐代西夏与稷放丹朱.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3).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 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5: 1087~1099.
- [15] 相对年代进入龙山时代的庙底沟二期类型末期遗存,以垣曲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的中、晚期为代表。(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

- 版社, 2001年; 韩建业:《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考古学报》2006年2期。)
- [1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运城市文物工作站, 芮城县旅游文物局. 清凉寺史前墓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6.
- [17] a. 韩建业. 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 中原文物, 2007, (1).
b. 韩建业. 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63~168.
- [18]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历史博物馆,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夏县东下冯.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b. 李伯谦. 东下冯类型的初步分析. 中原文物, 1981, (1).
- [19] 相对年代进入龙山时代的仰韶文化谷水河类型末期遗存, 以新安西沃、济源长泉“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代表。[河南省文物管理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一),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年, 第391~422页;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一),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年, 第4~94页。]
- [20] 以郟城郝家台一、二期和上蔡十里铺二、三期为代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郟城郝家台》, 大象出版社, 2012年; 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河南上蔡十里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3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 第69~80页; 韩建业、杨新改:《王湾三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1期。)
- [21] 我曾经将王湾三期文化前期遗存分为A、B、C三群, 其中A群为石家河文化因素, B群为龙山文化因素。(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2期; 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 第166~168页。)
- [22]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
境信息.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 [23] a.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襄樊市博物馆, 随州市博物馆. 西花园与庙台子.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b. 韩建业. 湖北随州市西花园早期遗存分析. 考古, 1999, (3).
c.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
d. 荆州博物馆. 荆州荆南寺.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 [24] a. 仇士华, 蔡莲珍, 冼自强, 等. 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 考古, 1983, (10).
b. 韩建业, 杨新改. 王湾三期文化研究. 考古学报, 1997, (1).
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 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5: 1112~1115.
- [25] a. 方燕明. 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碳十四测年的若干问题讨论. 中原文物, 2015, (2).
b. 何弩. 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第3卷).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54~86.
- [26] 比如禹州瓦店王湾三期文化一期HW97IVT3H61为公元前2255年。(方燕明:《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碳十四测年的若干问题讨论》,《中原文物》2015年2期。)
- [27] a. 张雪莲, 仇士华, 蔡莲珍, 等. 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 考古, 2007, (8).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二里头(1999~2006).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4: 1231.
- [28] 我曾经推定鄂北地区龙山遗存的下限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韩建业:《湖北随州市西花园早期遗存分析》,《考古》1999年3期。)
- [29] 韩建业. 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196~201.
- [30] 严文明. 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7: 94~103.

(责任编辑: 刘亚玲)